

## 清华国学“从未断档”

——访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

○ 本刊记者 陈晨 学生记者 赵岗



刘东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兼中国矿业大学客座教授。1955年生于江苏徐州，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和指导方向为“比较美学”与“国际汉学”。著有《西方的丑学》（1986）、《浮世绘》（1996）、《刘东自选集》（1997）、《理论与心智》（2001）等。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成为“年度文化事件”。近半年以来，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发展和建设情况依然吸引着诸多关注。为此，我们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

《水木清华》：2005年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和争论，这些争论包括：什么是国学，现在这个环境下成立国学院到底应不应该等等。清华成立国学院后，我们看到这些争论依然存在，那么您对“国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和定位是怎样的？

刘东：围绕“国学”一词，先后出现过这么几重意思：第一：国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古代，指的是国家开办的学校，就是国之庠序，而不是某种知识领域。事实上，正是在西学东渐之后，国人在遭遇外来冲击之余，发现除却西学之外，还有本民族的学术文化，叫做国学。所以它是参考着一个外来的他者，才得以重新界定自己的。这既是意识到了我们的局限性，同时也是要

保护自己的特色。

第二：相对于汉学来说，和它相对应的就是国学，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人家要剖析你，于是相应地就有了国学，因为中国人也要研究中国，要内省地研究自己的文明。

第三：我们虽然不断受到西学冲击，却在冲击中又保持了某种弹性。几千年文明就是一个巨大的经验综合体，它在不断的对话中面对这种冲击，必然会有所反弹和变异。清华国学院就是一个好例子，其中著名的五大导师，当年都首先是在西学方面领先的，然后他们再借鉴西方来反观中国，创造了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形态。比如梁启超，不仅在中学方面是通人，在西学方面也同样通人；再如王国维，他首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专家。其他几位就更不用说了。

第四：国学又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相对于西方产生的民族国家来说，别的国家为了在文化上自保，也都产生了各自的国学，甚至连“国学”这个作为现代话语的词汇，当年也是从日本引进的。也就是说，在西方冲击

和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世界各国都会产生它的国学。

第五：国学到了今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也必须在文明的对话中上升到普适与共生。

《水木清华》：清华老国学院可以说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神话，在时隔80年之后清华成立国学院又有怎样的考量和背景？

刘东：尽管时隔了80年，但我从来不会用“断档”这个词来描写这一段历史。清华有非常了不起的传统，即老清华的人文传统。所以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清华国学院其实从来没有中断。那些从清华国学院毕业的前辈，披着一身国学院的辉煌，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当我们身在社科院或北大的时候，大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有着清华情结，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清华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这种传统当然应该发扬光大，即使有一段时间被忽略了，也终将是

要恢复重振的。

清华国学院的重振，肯定和近来国学广受欢迎有关，这种大环境正说明了民心之所向。但无论如何，国学不应只出现在电视中，也应走进学理研讨班；不仅可以具有娱乐性，更要显示出严肃性；不仅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更应显示出学术品格。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华做出今天的举措，可以说正是时候！再加上清华确实有过辉煌的过去，那么清华继续开办国学研究院也是责无旁贷的。

《水木清华》：清华国学院成立以来这一段时间主要的建设和学术活动有哪些？

刘东：国学院的预想规划，现在都已经基本铺开了，我把它总结成“一二三四五”。一就是一份《国学文摘》，该文摘每半年出版一次，其中摘录全世界包括欧美、港台汉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二是指两本杂志，即我主编的《中国学术》，还有刘迎胜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元史》。

三是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即将启动的三大讲座。其中，“梁启超讲座”将由陈来教授主持，其大体的方向将是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将由我主持，其大体方向是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而“陈寅恪讲座”则由刘迎胜教授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持，其大体方向将是元史及边疆民族史。今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还想创办其他讲座，比如赵元任讲座、李济讲座，还有专门纪念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教授的讲座。

四是四套丛书，其一是将前面提到的三大讲座，汇总成《清华国学讲演丛书》，它可以使清华之外的更多的人受益，也将为这个时代的中外深度交流，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录。其二是将全面整理清华国学院几位导师及其众多弟子的著述，编纂《清华国学文存》。现在学术界对于清华国学院院史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而对其导师和学子著作的系统整理，更显得尤为欠缺。比如，像梁启超、王国维这样显赫的导师，其著作都缺乏一个完备的善本，更不要说在五位导师之外，还有不少像浦江清等曾在这里代过课或当过助教的学者，他们后来都取得过很高的成就。接下来，在清华国学院的历届毕业生中，后来有相当一大部分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学术研究既体现着清华国学院的教育成果，也是学术薪火传承的重要环节，但其中不少人的遗著和业绩都未曾得到充分的整理和评价。我想，只有在对每一个人都编出学案，并整理出一卷选集之后，人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纵览到本院当年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大家也才能更加切实地去体会和总结清华国学院当年的经验，这也是我们自己对清华国学院的历史负责；其三，我们还将创办一套《清华国学论丛》，专门收录本院教授、合作学者和访问学者的最新成果，国学院会提供15个高端学者的位置，给大家公开竞争的机会，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到国学院来做研究。我们还会实行member制，即凡是在国学院工作的学人，无论资质深浅，都是理所当然的member，都可以平等享有学术发言权，从而共享一个自由宽松的讨论空间；人

们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也都会轮流拿到院里来展示，接受同行们的挑剔与批评。由此，最终自然会形成一些成果，然后我们会把它们拿到学术委员会上，讨论它们是否够格纳入《清华国学论丛》；第四个丛书是《清华国学译丛》，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整个国家都有一种愿望，想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高端学术文化。国学院会首先选取部分导师的代表作，将它们翻译成英文。比如，我们首先会推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英文本。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在和译林出版社合作，译林出版社也专门设立了译林fellow，请国外学者来访问一年，既做一点自己的研究，也帮助我们来润色一本英文书。

五就是我们设立五个研究室，这跟老国学院的编制一脉相承。

《水木清华》：就是说清华国学院要将“走出去”转变为“引进来”？

刘东：事实上，这也是在纪念和继承老国学院的传统。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所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邀请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这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现在的国力不知强大了多少倍，可惜在学术交流方面，至少在文科方面，还都是国外的交流对手在出资金定课

题，这样话语权就掌握在别人手里，造成了诸多的被动。

杜威和罗素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多么贫弱！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特别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平心而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来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会出现脱节和错位。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

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

《水木清华》：我们知道清华国学院成立后不会以教学为主，对于这种运作方式，有些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样是为了尽快出成果，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刘东：鉴于目前的整个体制，也只能参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做法，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而只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高阶研究和进修为主。你看在教育部那边，“国学”直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学科代码，怎么进行教学活动呢？由此令人想起，80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存在。当年建立清华国学院时，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在清华形成，它自然要类似传统书院的教育形式，更像是导师和学生一块在做研究，让教授们真正在言传身教，而让同学们终身持守。

我们遭遇到的另一个体制障碍是，清华国学院的预设教授职位是五个，但身在外地的刘迎胜和姚大力，尽管学术水准是公认的，但档案却根本调不来，因为劳动人事部有一个硬性的规定：50岁以上的教授不准调入北京。然而，从我们的学科特点来说，五、六十岁正是人文学者最出成果的黄金时代。由此不禁想起龚自珍的那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借此还发出一点畅想：我曾曾在斯坦福客座过一个学期，尽管它的文科规模较小，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大学之一，有“西哈佛”之称，当然“东哈佛”就是哈佛本身了。我想，如果清华能在结构上调整成为斯坦福，就是

多半个MIT，再加上少半个哈佛，它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而此中的关键就在于，一定要有一个“小而精”的、在学术话语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科！

《水木清华》：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所谓的‘国学热’，到今天的真正的‘国学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推动都不大。”您也有这种感觉吗？

刘东：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普及和风传国学，但是普及和提高却是两回事。借助大众传媒可以做到的事，我们国学院就不必再做了。我们更多要做的是研讨学理，研讨儒家这样一种哲学态度、处世精神，它和现代社会怎样去结合，和佛教、回教、基督教的精神怎样去对话。要知道，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思考出让人类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当轴心时代的四大圣哲走到一块的时候，实际上就没有一个圣哲了，他们互相就把对方给解构了，发现原来咱们都是有局限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还太年轻了，我们必须去寻找一种可以供我们后人师法的生活方式，才能算是成熟起来。我们应该保留儒家这样一个价值选项，加入到文明对话中间，并且在文化间性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出一种让世界从杂多走向整一的生活方式。今后的20年，我想给自己多留点时间去思考，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答案。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的车轮能滚多远，世界的车轮能滚多远，这都不可逆料，我只求能这样想：我们毕竟为后人铺了一条路，他们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且越

走下去就越幸福越心安。

《水木清华》：国学院会请很多国际的大师来讲座交流，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国外汉学界对中国的关注点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刘东：这段时间，西方的中国研究也有些微妙的变化，这跟中国在经济上跟他们的联络越来越紧，也是有关系的。有一些国外的公司垮了，因为中国把他们的生意抢了，他们的看法可想而知。第一辆中国的“奇瑞”汽车到美国展销时，那么低的价格，让整个美国的汽车业都发抖。但也有一些公司，因为拿到了中国的订单而一下子去了，自然兴高采烈。所以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从来是双面的。

总的来说，汉学家们的心情上，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以往在北美大学的东亚系中，分为研究Chinese Study和Japanese Study的学者，其中做日本研究的都很快活，因为日本除了二战之外都是国运昌盛，人民生活也很富足，但做中国研究的人都很沉重，受到了咱们整个国难的压力。不过，最近的情况有所转变，研究中国的也跟着我们，突然发现了很多新的机会，相当庆幸。

“中国强大了好不好”？这的确是个问题。我曾在《中国青年报》用了一个整版，来讲这个大国，究竟是“王道还是霸道”，——假如为了霸道的大国，那又有什么好？你给别人和自己带来的都只是另一场灾难！

“大”字在中文中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传统中国人成人之时要行一个冠礼，意思是说：从此之后你要以一个“大人”的标准来约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

束自己。所以，大国也一定要具有道德的含义，对内要成为首善之区，对外要承担道义责任。

《水木清华》：由于清华老国学院的影响，国学研究院的成立自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您认为今天的清华重操国学研究的旧业，我们应该如何扬长避短呢？是否会遇到一些困难？

刘东：两次建院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差异，清华和老国学院的关系其实是这样的，先有清华学堂，再有它的研究院国学门，然后才有的清华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国学院当时最好办，人才是现成的，花钱也最少。而现在，各类学科也早已形成规模，却偏偏只有国学这一行，面临着中断失传的危险。此外，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成立，由此自然要为了凝聚师资，而承担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而现在，清华大学早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

当年清华的文科的传统，在厚重程度上并不亚于北大。一方面是因为，当年清华的资金比北大充足，另外也有些管理体制

方面的原因，比如说考核制度。照现在这样子不断的考察，只能给一心做学问的人添乱。当然，有两件事还是要首先做好的，第一是你认不认可这个人的学问，第二就是你认不认可他是在一门心思做学问。如果这两件事你都认可了，别的你就不用管了，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记得当年清华的文科晋升，都是冯先生一个人说了算，大家又都觉得很公平。一旦进行形式主义的投票，反而出现很多弊端和黑箱。

学校方面希望我们的研究院，能把自己的活动融入整个清华，这当然更是国学院的希望，——希望我们的讲演能被共享，希望同学能得到国学通识的滋养，希望整个校园的人文氛围更浓郁。试想一下，为什么以美国之大，拥有那么多超一流的科学家乃至经济学家，偏偏在超一流的思想家方面，还赶不上一个小小的巴黎？正是因为美国缺少塞纳河畔那样的既悠闲又热烈的、足以自由发挥的咖啡馆。就是说，对于文科学术，最好能在管理的问题上少一些限制，而多一些鼓励和宽容。只有这样做，才是对清华原有传统的最好恢复！